

讀書人的百年紀念儀式

陳禾

「是誰傳下這行業，黃昏裡掛起一盞燈」。張冠生寫作《紙年輪：民國以來百年中國私人讀本》初稜，全因二〇〇八年參加深圳「三十年三十本書」活動所受的啓發，覺得「自己從小到大的精神滋養，大概主要得益於這百年中國的思想激盪、社會變遷和文史讀物」，「應有個紀念儀式，不是一群人的紀念，不是廣場儀式，是內心儀式」。這麼說來，本書梳理的百本書籍，以及每本書後附以的千字短文，算得是張冠生「心靈儀式」的一次真誠表白。

百年來的中國，如同一條匯聚家國苦難曲折的歷史長河，大事頻仍。基於無法回到歷史現場的原因，按照歷史事件發展順序，梳理各種抵近歷史現場的書籍便成為不多的選擇之一。在張冠生羅列的這個書單中，每個年代，幾乎總有一些書籍會折射出強烈的歷史重大事件信息。如《全民族戰爭論》、《胡適思想批判》、《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等。這些書籍帶有強烈的「時代感」，以及濃厚的宣傳色彩。基於此因，有的書籍難免扮演「雙重角色」，即作為書籍內容所要表達的本義是一方面，體現書籍所處時代的社會角色與地位則是另一方面。比如今天我們回頭再看看《胡適思想批判》，如果結合歷史背景，興許在書外能有些意外的收穫。

儘管張冠生努力避免所列書單落入「衆所周知」的俗套，但還是選擇了歷史當代著名政治人物的相關書籍，如《袁世凱軼事續錄》、《列寧生平事業簡史》、《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永遠懷念您》、《鄧小平文選》、《我向總理說實話》。這些書籍所述人物大都在歷史上產生過極其重要的影響，走近這些重要歷史人物，也是讀者走進幽深歷史的一條重要路徑。

出於長期研究社會科學的需要，也是個人愛好的使然，張冠生閱讀範圍相當廣泛，在本書中所列的百部書單中，涉及門類衆多，除了上面提到的政治人物外，還有涉及政治思想的《亞里斯多德》、《社會論》、《理想國》，涉及歷史範疇的《古史辨》、《歐洲近古史》、《中國史話》、《世界史綱》，涉及自然科學的《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只有一個地球》，此外，還有一些書籍關乎文學、醫學、教育、經濟等多個方面多個層面。

張冠生曾是費孝通教授的得力助手，也是《費孝通傳》一書的作者。不知是否出於向費孝通的致敬，在精心編排的這個百年書單中，張冠生多次嵌入了「費孝通元素」，比如編入的費孝通著（譯）作有《江村經濟》和《人文類型》（費孝通譯）。作為同一作（譯）者，像這樣被多次提及，在本書百部書單並不多見。張冠生仍嫌不夠，還將首本書獻給了給費孝通以文學啓蒙的《少年》。相對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日創刊的《新青年》，由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一一年創辦的《少年》，其讀者群體年齡較小，在社會上不可能產生像《新青年》那麼大的影響力，但對於青少年群體，也展現了「潤物細無聲」的深厚功力。某種意義上，正是這本雜誌左右了費孝通後來的道路——閱讀，常常會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人，常常也會為個人作出正確選擇奠定思想基礎。

作為一名長期浸淫閱讀生活的體驗者，本書文字質樸，史料豐富，文章短小精悍，不過，張冠生並不是簡單的推介，而是在精短的文章中，努力融入自己的真知灼見。在《中國地理沿革圖》一文中，其就南海諸島地圖標識問題指出，這「實質是國家安全問題」。許多時候，他只是盡可能將自己的觀點融入字裡行間。如在《王杰日記》一文裡，就後來出版社刪簡了著名英模王杰為防緊急集合提前半小時起床準備的造假一事，他認為「原文出版可能更好，更利於看出作者的真實心境」。不難看出，張冠生的閱讀並非被動的接受，更像是一次思想遊走於字裡行間的愉快旅行。

百年，只是一個時間的里程，其實每個人的眼裡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百年印記。張冠生選擇從閱讀出發的這種「心靈儀式」，這既是其長期閱讀習慣的一次梳理，同時也是知識思想與百本書籍的一次次「聚合反應」。由此我們或可得出，閱讀，從來不應只是基於書本表面的閱讀，而應盡可能綜合多門學科乃至歷史背景的複雜思想活動。



來幾乎就是「臨時工」的天下，是正式工不願幹的又危險又艱苦的工作。現在幹部和事業編職工要漲工資了，竟然不給「臨時工」漲。幹活時把你看成國家工作人員，但漲工資時你就是「臨時工」了！甚至有些官員還恬不知恥地說，正式工和「臨時工」就不是一個樣！筆者想反問的問題是，工作時你怎麼不想着自己是正式工呢？不同工同酬不正是違法的問題，更是政府的道德良知問題，因為政府是在「卸磨殺驢」。

不客氣地說，在基層這種集體性勢利經常能看到的，官員違法成了習慣性行爲。強勢者不會把自己的強勢看成不公平，可悲的是，弱勢者卻覺得自己被傷害理所當然。應該說，國人中不乏「阿Q」是事實，但是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允許集體性勢利的存在嗎？允許強勢者肆意違反和破壞社會的公平正義嗎？人生來不一定平等，但是社會應該讓你得到平等的地位和待遇，這才算是社會的文明進步。一個政府必須維護公平正義，或，一個政府的底線至少不能破壞公平正義。

也說「集體性勢利」

魁興



心理學有個定律：一個人一貫在別人設定的某種情境中生活，時間一長，哪怕這種情境再不合理再不人道，被損害者也安之若素。對此，內地雜文作家游宇明在《集體性勢利》一文中說，強勢者固然不覺得自己享受的特殊待遇有何不公平，弱勢者也往往潛意識地認為自己已被損害理所當然。集體性勢利即使惡性發作，也不可能得到有效阻擊。應該說，這些現象是有違公平正義的，但我們不得不說，這些現象又是客觀存在的。

我們多數人都會想當然地認為，一個社會最應維護的是公平正義，即使有違反公平正義的行爲，也不會有公開違反公平正義的言行。然而，我們想錯了。有的單位招聘員工時竟然明碼標價，九八五、二一一高校的畢業生一個價，二本生一個價，三本生一個價，專科生又是一個價。甚至有一個央企招聘員工，只要九八五、二一一高校的畢業生。更有甚者，游宇明在文章中說，清華大學的一名教授竟敢公開宣稱「強姦陪酒女比強姦良家婦女危害性要小」。一些反惡政、法治、人權的言論竟然不時地見諸某些媒體。似乎這還是一個強權社會，誰有發言權，誰就可以想說什麼就說什麼，至於是不是違反公平正義好像沒有人考慮。

集體性勢利即使惡性發作，也不可能得到有效阻擊！這是非常可悲和可怕的。尤其是在養老改革和同工同酬方面，集體性勢利表現的尤為突出，而有關方面竟然視而不見。

由於內地機關事業單位沒有和企業一樣實行養老制度改革，導致機關事業單位退休金和企業退休養老金差距懸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以至於機關事業單位改革養老制度的呼聲很高。如今機關事業單位要推行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了，然而，改革是改革了，但是並沒有想方設法縮小機關事業單位人員和企業員工的退休金差距，而是想方設法要維持之前的退休金差距。改革是應該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制度改革能推進社會公平正義嗎？機關事業單位是應該進行養老制度改革，但改革是爲了維護退休待遇相同嗎？一個集體性勢利就要忽視社會的公平正義嗎？

同工同酬是《勞動法》的規定，也是《憲法》「人人平等」的具體體現。然而，同工同酬落到地上了嗎？在一些單位，正式工和派遣工同樣的崗位同樣的工作，甚至派遣工的工作比正式工更爲繁忙更爲艱苦，但是，正式工的工資卻是派遣工的幾倍。在機關事業單位的非工勤崗位，也多有「臨時工」的身影，他們幹的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工作，拿的卻是「臨時工」的工資，甚至是當地的最低工資。筆者知道的一個單位，原來實行的是同工同酬，因為原來幾乎就是「臨時工」的天下，是正式工不願幹的又危險又艱苦的工作。現在幹部和事業編職工要漲工資了，竟然不給「臨時工」漲。幹活時把你看成國家工作人員，但漲工資時你就是「臨時工」了！甚至有些官員還恬不知恥地說，正式工和「臨時工」就不是一個樣！筆者想反問的問題是，工作時你怎麼不想着自己是正式工呢？不同工同酬不正是違法的問題，更是政府的道德良知問題，因為政府是在「卸磨殺驢」。

兩次「御批」和四進「國參」

邵幹



一九九八年至二〇〇八年，我擔任兩屆吉林省人民政府參事。十年間，我積極參政議政，共提出四十多篇建議。政府領導批示率達到百分之百，批辦率百分之九十六。其中成為亮點的，是我的建議得到江澤民、習近平兩任總書記的「御批」和四進「國參」的奇遇。

胸懷全局，心繫國是才能抓住事關全局的重大課題，才能提出有分量的建議。作為參事年年列席人大和政協這「兩會」。「兩會」是我們國家實施民主政治、多黨合作、廣泛聽取人民群眾意見的重要會議。人民代表和政協委員是「兩會」的當然主體。但是，我們的新聞媒體多年以來對「兩會」的報道存在「兩多兩少」的現象，即報道領導的活動多，報道代表和委員的活動少；報道領導的講話多且長，報道代表和委員的意見少。我認爲，對於新聞媒體來說，是報道主體的顛倒。

針對這種情況，我在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日（兩會之前），提出了《關於改進人大、政協「兩會」報道的建議》，呼籲媒體把鏡頭、版面、時空對準代表和委員，多報道他們的意見、建議和呼聲；呼籲領導多到代表和委員當中，多聽意見，少講沒有新意的套話、空話！

沒想到，這一建議得到吉林省幾位主要領導的一致贊同。省長洪虎批示：「所提建議頗有道理，請雲坤同志閱示。」省委書記王雲坤批示：「所提建議很好。就照這個思路辦。請人大領導重視這個請有關人

員落實。」省委常委、宣傳部長石宗源批示：「請各新聞單位遵照雲坤、洪虎同志批示精神，改進兩會的宣傳報道。」省人大主任批示：「已研究了落實意見及措施，並已送人大各位副主任。」

事後，在省政府參事室《簡報》（二〇〇〇年二期）上又全文刊發了本建議並加編者按語：「此建議受到省領導的高度重視以後，省委宣傳部召開省直各新聞單位做了傳達和部署，各新聞單位紛紛調整了原擬定的報道計劃，增加了對代表和委員的報道篇幅和分量。建議在全省引起很大反響。」

事後，省政府參事室又把此建議呈報國務院參事室。國參沒有耽擱，上「直通車」直接呈報總書記江澤民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總理旋即批示：請錦濤、溫清、關根閱處。接着江澤民、胡錦濤、李嵐清均做了批示。中央宣傳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領導也做了閱批。

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陳鶴良來吉林省時，當面對省長洪虎說：「一位參事的建議，受到中央四位常委領導的重視和閱批，是國務院參事室有史以來從未有的，但是我又如鯁在喉，按捺不住想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於是，二〇一四年元旦剛過，我就上書黨中央習

近平總書記，提出「改進會風首先要改進「兩會」會風的建議」。提出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之「兩會」，是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實施民主政治的重要會議，應提倡講真話、實話，廢止套話、空話；代表委員應履行監督批評職責，廢止歌功頌德；會議應減少程式性和純形式性的活動，縮短會期，節儉開會。建議由省參事室、國務院參事室呈報黨中央和總書記。二月中旬，我還在海南三亞避寒，省參事室處長呂長新突然打來電話說：邵老，你的「改進會風首先要改進兩會會風」的建議，習近平總書記閱批啦，栗戰書、馬凱、劉奇葆等領導均做了批示。不久，「兩會」召開，我特別關注的就是會風，確實有些變化。但是，距離我的期待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啊……

此其「御批」也二。

四進「國參」。全國參事大約有近二千人，作為一個地方參事，在短短幾年裡能夠四進國務院參事室，也算一種奇遇了。

二〇〇二年十月，國務院參事室召開部分省市參事室主任和參事（約十幾位）會議。參事室主任閻書勤通知我和他一起參加這次會議，並說「這是國務院參事室點名讓你參加的」。

會議的任務是，中共中央、國務院要頒發一份關於加強參事工作的權威性文檔，徵求與會者意見並幫助修改。我是參事小組的召集人，在會上發了言。我提出，參事室是一個統戰性、諮詢性的機構，要嚴格控制中共領導幹部百分之一的比例，更不能變成退休「領導幹部的俱樂部」，得到與會同仁的認可。這是我第一次進國參。

二進國參是參加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參事工作會議」。吉林省出席會議的三人，秘書長馬俊清，參事室主任閻書勤和我。三人均在大會上發了言。這是我第一次走進中南海，第一次坐在國務院第一會議室開會，第一次在紫光閣照相，第一次見到王海容（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風雲人物，毛澤東的英語翻譯。時任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

三進國參是我萬萬沒有料到的，用省政協《協商新報》消息導語的話：「我省參事邵幹進京給國務院參事上課」。二〇〇三年秋，國務院新聘了幾位新參事，爲了讓他們盡快進入角色，盡早發揮作用，辦了一個新參事培訓班。國務院參事室副主任蔣明麟開場白介紹說：培訓班特意請湖北的王福林參事、吉林的邵幹參事前來傳經送寶，講講當好參事的心得體會。二〇〇〇年，邵幹一份關於改進兩會報道的建議，受到中央四位常委閱批，這在國務院參事室是史無前例的。可見，當參事是大有可爲的……從此，我成爲參事大有可爲的「標籤」。

四進國參。二〇〇五年，國務院參事室舉辦「全國新聘參事培訓班」，來自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新參事六十多人參加。邀請安徽參事何愷蔭和我前去「傳經送寶」。有了第一次進國參講課的經歷，膽子就大了，我大批了一通有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事，存在榮譽感多，責任感少；官本位思想多，監督意識少；歌功頌德多，批評意見少，甘當「花瓶」的壞風氣。場下一位學員插話說：邵參事，在坐的有不少代表和委員呢？我當即說：正因為我知道有代表和委員在才這樣說，不然就是對牛彈琴了！擦出了點點火花。

如今，我已年近八旬，省裡又給了我一個「離任參事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頭銜，得以和離任參事老哥們每月歡聚一次。大家暢談十八大以來改革的大好形勢，反腐敗的大快人心事。快哉，快哉矣！

參政議政

心繫國是

（網上圖片）



我們夫妻於二〇一三年十月參加第二屆蘇北文化節，有緣從棉蘭一路北上遊覽，終於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壯闊與明媚。多峇湖處於海拔九百零五公尺的高山上，所以公路層層而上，攀沿九曲十三彎，加上一路靠靠煙雨，巴士以低速爬行的遊興。對旅行者而言，這樣更能激發大家的遊興，可以暢目抒懷，悠然四顧，正合心意呢！

下午兩點左右，巴士終於停在多峇湖畔，一片渺茫，波光粼粼的菱鏡連接到寬遠遼闊，遠望不到盡處；這哪裡是湖，簡直是茫茫煙海，面積一千一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寬度，竟擴闊到收不進眼簾呀！人類啊人類，在天地萬物間何其渺小啊！

旅客來不多峇湖，有兩個景點是必選的去處，第一是浮在湖中的夏夢詩島，第二是馬達

多峇湖與夏夢詩島

冰谷

根據史學家考證，形成多峇湖那場火山的爆發，是地球二十五萬年來最激烈的一場爆發，影響至鉅，甚至因此轉變人類的基因——啊呀，這些真是太玄妙太複雜的問題，非我們尋常百姓所能理解與感悟；我們只知道若沒有那場慘烈的火山爆發，肯定今天我們見不到美麗而浩渺的 Lake Toba。

我們夫妻於二〇一三年十月參加第二屆蘇北文化節，有緣從棉蘭一路北上遊覽，終於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壯闊與明媚。多峇湖處於海拔九百零五公尺的高山上，所以公路層層而上，攀沿九曲十三彎，加上一路靠靠煙雨，巴士以低速爬行的遊興。對旅行者而言，這樣更能激發大家的遊興，可以暢目抒懷，悠然四顧，正合心意呢！

下午兩點左右，巴士終於停在多峇湖畔，一片渺茫，波光粼粼的菱鏡連接到寬遠遼闊，遠望不到盡處；這哪裡是湖，簡直是茫茫煙海，面積一千一百三十平方公里的寬度，竟擴闊到收不進眼簾呀！人類啊人類，在天地萬物間何其渺小啊！

旅客來不多峇湖，有兩個景點是必選的去處，第一是浮在湖中的夏夢詩島，第二是馬達



《蘇幕遮》描述的「煙雨濛濛」景色，是從迷離縹緲中幻化出來自然風光。

知道多峇湖，是由初中華文的課本上《美麗的多峇湖》開始，文情並茂的讀本，今天記憶仍深，有關湖的形成，傳說是一對男女因戀愛受惡霸阻礙，男的大力以腳一踹，就踹出一個渺遠大湖了。但從地質歷史演變的事實去求證，多峇湖乃火山爆發形成的火山湖，時間追溯到七萬五千年；從人文地貌上作省視，是一項驚天地動地的浩劫和災難，但對地理環境與人文演變的衝擊，我想史學家也難作評估。

根據史學家考證，形成多峇湖那場火山的爆發，是地球二十五萬年來最激烈的一場爆發，影響至鉅，甚至因此轉變人類的基因——啊呀，這些真是太玄妙太複雜的問題，非我們尋常百姓所能理解與感悟；我們只知道若沒有那場慘烈的火山爆發，肯定今天我們見不到美麗而浩渺的 Lake Toba。

「修齊治平」

顧農



中國儒家大人物都是政治家，他們最關心的是治國平天下；而爲了達此目的，政治家本人必須修身、齊家，然後才能大展宏圖，領導廣大的地區。這就是《大學》裡所說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以「平天下」爲最高目的，其他都只是手段和準備。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儒家的種種策劃「都是爲了治民衆者」（《且介亭雜文二集，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修齊治平」的四字訣也正是如此：先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再做一個好家長，然後領導一個「國」，最高目的是做個好皇帝——這是爲未來的領袖人物作出的策劃。

那時之所謂「國」乃是諸侯國，面積小的相當於現在一個大市，大的相當於一個省或幾個省；「天下」則指全中國。在孔子孟子的時代，各「國」的情形各不相同，可以說都不大高明，各路諸侯問題不少，全國離統一尚遠，更不必說天下太平了。

總之，傳統的「修齊治平」中同老百姓有關係只有前一半的「修齊」二字。修身本身自有其意義，並非只是爲了齊家；而齊家的目的也並非準備擔當天下國家的大任。治國平天下方面的大事，老百姓自然也關心，也會有所議論，但不必自己去做。